



新冠肺炎 深度

疫时回乡记

断货的米铺和停摆的习俗：“封城”传闻中的潮汕春节

这就是阿甘本所谓的“例外状态”，日常生活被扰乱，公共秩序失衡，安全感缺失，人人处于自危中。

特约撰稿人 林培源 发自广东汕头 | 2020-02-04



2020年1月26日，广州南站。摄：林振东/端传媒

一、“封城”半日

这次新冠病毒肺炎汹涌来袭，镇上没人抢醋，改为抢米囤米了。

我的家乡在潮汕地区一个叫盐鸿的小镇上，小镇地处粤东，位于潮州、饶平、澄海三地的交界地带。324国道横穿过小镇，将小镇划分为南北两片，北边是莲花山南麓，山脚下坐落着厂房、汽修店、商铺等，南边是居住区，往东与饶平接壤，沿着国道再走大约半小时车程，就是福建漳州了。小镇由鸿沟和盐灶两个乡组成，生活着大约五万余人口。我所在的鸿沟乡有四个行政村，村民是南宋末年自福建南迁过来的林氏后裔，整个乡都姓林。我家世代就居住在这里。

2003年闹非典的时候，我读初中，家里没网络，环境相对闭塞，除了电视、报纸和口头传播，并无其他可以了解外界信息的渠道。我印象较深的是，镇上有人在广州读大学，因为感染被隔离了，一时人心惶惶，电视每天都在播“白衣天使”的故事，我第一次知道了钟南山的名字。大家以为中考必考的时政热点，最后都落空了。抢醋抢盐的事时有发生，家里也跟风买了板蓝根。镇上一家醋厂的老板就是从那时开始发家的。非典最严重的时节，醋价疯涨，从一两块一瓶，涨到了二十块一瓶。

没想到许多年后，醋可杀死病毒的谣言还是满天飞。我爸几年前告别了水产养殖业（他养了二十多年的牛蛙），曾在非典时期发家的醋厂里做过工。他常年从事体力劳动，身强体壮，一人可顶两个工。醋厂活不重，工作环境卫生，伙食也不错，那阵子他体重增加了不少。可惜醋厂工资不是很高，我爸干了几个月，就转去装修队，做起了木工的老本行。

这次新冠病毒肺炎汹涌来袭，镇上没人抢醋，改为抢米囤米了。事情的起因，是1月26日上午广为流传的一份文件，汕头市政府发布通告，宣布对市内公共交通系统（包括船只、公车、出租车、网约车等）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一切外来人口进入（途径汕头的高速不封路）。微信时代，消息流传极快，整个汕头市区包括底下的村镇都炸开了。1月23日武汉封城时，我在武汉的朋友惊恐万分，“逃离武汉”一下子成为微博上的热门话题。我没想到的是，“封城”（在普通人眼中，交通管制就是“封城”）这么遥远的事竟会让自己碰上——要知道汕头这个港口城市，和武汉的距离足足一千公里。



2020年1月27日，广州一间超市的货架上食品已被抢购一空。摄：Stringer/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大年初二那天，按照习俗我陪妻子“回娘家”。我们打的车停在村委会门口，司机靠着一辆白色的吉利在抽烟。上车后我不经意间瞥见他戴上了口罩，一问才知，网约车公司有规定，疫情时期必须戴口罩，轻则扣分，重则停运。我在半路上看到交通管制消息，颇为震动，和司机说起这件事，他说，现在区和区之间也开始（对过往车辆车主、乘客）测体温了，高速路口查得更严。隔着口罩，司机声音听起来有些嘤嘤嗡嗡。春节期间网约车有补贴，但他并不想跑，听闻消息，他有些如释重负。

让我更没想到的是，“封城”只维持了很短时间，到下午通知便撤回了（外媒还第一时间报导了汕头block down的新闻）。这期间发生的最大一件事是，群众上街，冲进店铺、超市和商场囤抢大米。封城带来的恐慌，让大家都失去了理智。我也不免紧张起来，一到城里就给我妈发微信语音，让她先去买米以防万一。她回复我，镇上米铺断货了，挨着公路的商铺大门紧闭，老板估计是想趁机哄抬米价，所以对外宣称没货，卖不了。听罢，我赶紧上网下单，买了几十斤大米。

以往我对这类公共事件并不上心，但是今次不同，疫情汹涌，连空气中也似乎弥漫着恐怖。随着时间流逝，那种恐怖的感觉愈发强烈。可笑的是，我睡了个午觉起来，“解禁”的新闻就传开了。本地电视台滚动播报，大意是敬告市民，汕头暂不交通管制，公共交通工具消毒后正常运营。丈母娘让我把下的单取消了。我松了一口气。

这个“朝令夕改”的事件很快就成为舆论焦点。我们当然明白“封城”的不得已和解禁背后的舆情压力。只是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民众的反应实在过于剧烈了。这是一种灾难应激：反正无论如何，首先要保证温饱，天会不会塌下来，谁知道呢？

潮汕向来是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因此也一直被“污名化”），大部分家庭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周边很多同龄人甚至年纪更小的女性，婚后就成了全职家庭主妇。老一辈遵守的家庭分工，流传下来成了一项默认的规则。汕头封城的消息不胫而走，我在东北的师妹发微信问我情况如何，她说在他们东北，即使足不出户，家里屯的白菜猪肉也够撑上个把月了。我回复说潮汕的妈妈们可不是这样，她们每天必到市场买菜，鱼虾蟹，都图活的、新鲜的。所以从生活习惯来看，不难理解为何封城会引发主妇们倾巢出动。据说有个大妈一口气囤了600斤大米，解禁的消息一出，欲哭无泪。



2020年1月23日，一班航机飞抵武汉机场。摄：Leo Ramirez /AFP via Getty Images

二、恍若隔世

我爸下午出去打牌消磨时间，碰上镇上派出所的警察巡逻，亮出手铐警告聚众打牌的人。一伙人很快收摊，作鸟兽散。

疫情开始紧张的前两天（1月20日），我从北京坐飞机回来。飞机上除了我，还有个年轻人也戴着口罩，就坐在斜对面，全程咳嗽不断。揭阳机场大厅里戴口罩的人寥寥无几。一回到家乡，条件反射似的，心理就不自觉地松懈下来，我甚至感到了一丝逃离危险地带的愉悦。潮汕平原不见冷，空气甚至有些闷热，我索性摘了口罩。回家路上，天清气朗，和雾霾时期的北京全然不同。

我在家安然度过了两天，22号，情况变得严峻，网上的疫情通报频繁更新，但镇上仍旧祥和安静，日常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也几乎无人戴口罩。直到汕头确诊一例、传闻一年一度的游神赛会（潮汕话叫“营老爷”）取消了，乡民才骚动起来。

正月初一早上，村头广播响起，播音员操着本地方言，播报疫情情况，宣传病毒防护知识和相关的注意事项。汕头市民政局下发了一项紧急通知，呼吁停止聚会、走访和群体性活动。这在往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潮汕人极为重视春节拜年的习俗，讲究“客情”，大凡拜年，礼品里必带双柑（柑大于桔，因此也叫大桔，潮汕话与“大吉”同音），换柑是春节必不可少的程序，有互赠吉祥之意。以前每到年底，我爸都会买一筐柑放家中备用，便于走亲访友。但今年，这筐柑派不上用场，恐怕要烂掉了。

交通管制的通知和民政局的文件只隔了一天。逢上春节，大量的年轻人和学生返乡，相对家中长辈，他们的安全意识较强，渐渐就形成一个信息交换的网络。疫情是随着口罩佩戴和型号等各种知识的普及而升温的。上面的政策一下达，乡民便警惕起来，镇上药店和诊所的口罩很快脱销了。丈母娘在城里跑了两趟药店也没买到口罩，只能用减少外出，连原本预定的正月初二的团圆饭也取消了，改在家里吃。我在网上抢到三盒N95口罩（准备返京时再用），所幸家里还有我大妹为了装修买的几包口罩，暂时能顶一阵子。

初一下午落起了大雨，直到深夜也没有停歇的迹象。一家人宅着，哪里也没出去，吃饭、睡觉，刷手机、看电视，讨论疫情。我爸下午出去打牌消磨时间，他不抽烟不喝酒，只喝工夫茶，平时除了干活，没有其他娱乐。放在往年，打牌的节目会保留到返工为止——几天后，闲聊时我爸说他在钢筋铺看人打牌，碰上镇上派出所的警察巡逻，亮出手铐警告聚众打牌的人。一伙人很快收摊，作鸟兽散。警察拍了照，我爸站在一旁，没被拍到。

我们镇上本来就没什么年味，小时候还能看到扛着冰糖葫芦沿街叫卖的外省人，还有卖氢气球和玩具的小贩，但近些年少了，只有每年正月初十、十一游神的时候，小贩才会多起来，今年游神取消，不要说年味了，连一个邀请亲戚朋友聚会的借口也没有了。

奶奶“食伙头”，有时在大伯家吃，有时来我家吃，天气太冷或者太热，就自己做饭。老人家不识字，虽然经历过非典，但当我们嘱咐她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时，她并不相信。我只好给她看宣传视频，讲解这次疫情的严重性，告诉她邻镇已经确诊了一例，是我的高中同学，年前去了武汉，现在和家人都在医院隔离了。加上乡里各种新闻和小道消息不断，老人家似懂非懂，渐渐知道自己也没法置身事外。

我和妻子是去年国庆在乡里祠堂摆的喜酒。按照乡里习俗，这算“新喜事”。年初四当天晚上迎神我得去提灯（潮汕方言叫“挂灯”，祈求人丁兴旺）；年初十游神，还要抬神像巡游。对这些习俗，我有些抗拒——一想到要在腰上扎着红绳在人群中游走，不免感到尴尬。谁知道初一当天，乡里的老年人协会发了通知，大意是为响应政府防控疫情的号召，等神活动改由老年人协会代为祭拜，其他村民切勿围观。不过随着疫情升级（广东在1月23日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迎神不得不停掉，正月初十、十一的社日活动亦随之取消。

从我有记忆起，游神这项习俗就未停过。从正月初九晚的祭神开始，持续到正月十一才结束。我在小说里写过游神，但那是90年代发生的事了。当年我还很小，政府取缔封建迷信活动，乡里的游神首当其冲。大批的武警特警在镇上集结，演变为流血的暴力冲突。警车被村民掀翻在地，警察逃进老爷宫，乡民点燃一种叫“企脚铳”的炮仗扔进去……许多年过去，那种原始的、野蛮的民风早已消失不见。这次活动取消，并没有遭到村民反对。回忆起二十来年前的暴力场景，竟有些恍若隔世的感觉。



2020年2月1日，广州，市民在商店外排队买口罩。摄：Stringer/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三、无济于事

网上流传着一段野猪在北京二环路上狂奔的视频，夜幕漆黑，路灯昏黄，黑褐色的猪鬃狰狞竖起。

我家附近的莲花山温泉度假村被征用为隔离区，自武汉返乡的本地人、疑似感染者被隔离在那里。镇上传闻有人从湖北宜昌回来感染了，消息传得极快，引起了恐慌。后来经过卫生院检测，体温正常，无发热咳嗽等症状，现在正被隔离在度假村。有人还将自己隔离期间的“佛系”生活发在抖音，每日更新，也算一种苦中作乐了。

过年，在外工作的家人都回来了，家中十几口人，喧闹、拥挤，从早到晚说话声不断。我宅在家无事可做，没法写论文，书也读不下去。这种无所事事，带有一种耗费生命的毁灭感。因为宅着太无聊，有人在微信群里发了数大米和葡萄干的照片。这种特殊时期的黑色幽默，有种让人看了觉得好笑，又不知如何是好的无力感。

初二晚上，我和妻子戴口罩下楼买奶茶，街上空空荡荡的，除了无人看守的夹娃娃机店和零星几家服装店、鞋店还开着，其他店铺一律关闭。奶茶店倒是生意很火，三四个年轻人在店里喝奶茶，都没戴口罩。我们去美宜佳便利店买东西，老板娘戴了口罩（露出鼻子），店里有她的两个孩子，儿子在收银台写作业，女儿拎着一只口罩，来回地蹓。一位老婆婆坐在小板凳上，看着进进出出的顾客。从她的外表和穿着打扮可以判断，她不是潮汕人，可能是老板娘的婆婆或者母亲。我用普通话提醒她戴口罩，她一脸慈祥地笑着，也没当回事。

正月头几天我不敢出门，只盼着能尽早返校，回归正常的生活，哪怕在宿舍里待着吃外卖，读书写论文，也是好的。然而很快，这种希冀就被无限延宕，成了一个奢望。

奢望的源头，和学校发生的事情有关。在我们放假回家的这段时间，由于疫情升级，学校将我们两栋博士生公寓楼的一二层征为医学观察区。我们那栋住进了二十几个从湖北、武汉返校的学生（有武汉旅行史、居住史和接触史的群体）。宿舍楼的微信群炸开了。楼里

那些春节留校没回去的同学反应最为剧烈。大家在群里发言，要求学校将已经入住的这批人转移到空楼，有人提醒我们注意，公寓楼所有楼层是共用一个通风和下水道系统的——非典时候，香港一栋居民楼住户集体感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不转移，等到大家集体返校，后果将不堪设想。

楼长转达的消息是，学生服务中心开了会，最后决定动员湖北、武汉返校学生集体搬至另一栋楼（那里曾是我们学院办公楼，去年底腾空了）。很快我们就收到了学校的通知：离校学生的校卡禁用了，所有返校学生必须第一时间激活校卡，再进行信息登记。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不放心，觉得有必要尽快推动转移的进度。我拟了封投诉信，在微信上向国务院办公厅留言说明了情况。

庆幸的是，到了晚上，学校发了春季学期延迟开学的通知，先前未经我们同意而征用的楼层也将腾出来。大家仿佛躲过一劫，微信群里的气氛也稍稍松弛了。

信息时代最方便的是，你可以远程参与到某个事件之中，也可能由于卷入其中而无法脱身。写投诉信时，我有些担心，毕竟疫情刚开始时，有八个所谓的“造谣者”被处罚了（事后证明，这八人并无造谣）。我一方面害怕自己可能措辞不当，信息不到位，又怕后续有其他情况，会让学校有关部门给盯着。但仔细一想，学校层面的做法不合理，我为什么不能投诉呢？

这事就算告一段落了，学校要求我们不要提早回校，开学时间另行通知。这种未知，往往带有“等待戈多”的荒诞。我有同学原本订了正月初三的票回去，打电话到学校一问，被劝退了，无奈只好退票，安心在家待着。

初四，我实在憋不住了，和妻子跑出去买肠粉当夜宵，恰好碰到一名小学同学。他跟我打招呼，我差点没认出来。蒸肠粉的机器热气腾腾，我们各自站着，很是尴尬。后来我和他攀谈，才知道他这些年一直在养牛蛙。他问起我爸，我说，已经不养了，现在给人打工。牛蛙养殖是我们镇上一大产业，饲料供销商、蛙农和买家形成密切的利益链，遇上这种天年，牛蛙养殖几乎被拖垮，简直要人命。我想起小时候，父母经常因为什么时机卖蛙而争吵，养蛙的人太多了，供求链不稳定，蛙价瞬息万变，有时候相差一两天，就卖不出好价钱。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之后的几天，国内的确诊人数不断攀升，从一两百，到上千，再到破万。各种消息扑面而来，好的坏的，搀杂着生命赞歌和死亡叙事：各地的医护人员奔赴武汉抗击疫情，某出版社出版了一位诗人写的抗疫诗集（人称“瘟疫诗人”）；黑心商家制造假冒口罩发国难财；医疗物资紧缺，医生护士用文件袋自制防护面罩，海外留学生群体自发捐赠口罩、防护服驰援国内医院；上海游客和武汉游客在日本机场吵了起来（“人民内部矛盾在境外爆发”），疫情隔离与地方主义话语缠结不清；防疫专家的话被媒体曲解，有人被误导，忍痛将爱猫爱狗摔死；老人家因为医院床位不足，只能自行在家隔离，怕拖累亲人，最终跳楼身亡；而关于医学期刊新英格兰杂志（NEJM）发表疾控中心疫情研究论文的新闻，更是在网上掀起了滔天巨浪……科学、公共防卫和政治相互抵牾，构成了真假难辨的罗生门。



2020年1月28日，北京的道路上有行人路过。摄：Nicolas Asfour/AFP via Getty Images

这一场疫情，暴露了国家治理的漏洞，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问题丛生：政府管理能力，突发公共危机的应急能力，医疗资源的供应，媒体报导传播的失衡，民间的自发组织空间……一边是医护人员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一边是网民对武汉慈善总会和湖北省红十字会的质疑；一边是活在虚假乌托邦中的愚众，一边是呼救无门、过着“次要生活”的人民。

我在失眠的夜里翻看手机，不断刷新的各种疫情新闻，虚虚实实，叫人幻灭。四千万网民观看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的施工直播，为“萌化”的叉车酱和铲车酱们打榜，这样的“云监工”简直叫人匪夷所思。那些日夜赶工、流血流汗的鲜活个体呢？直播的镜头可曾对准过他们？

这场疫情牵动了亿万人的心，寰宇同此炎热，无人能够独善其身。有人悲观地说，如果鲁迅活到今天，见此世相，会发现从医从文，都无济于事。作为一名小说作者和文学研究者，我时常深陷自我怀疑，面对社会危机，我能做什么？马克斯·韦伯说“以学术为志业”，但这份志业，更多指向一种反思和批判精神，我们熟知各种概念和套语，操起理论板斧时胸有成竹，但在复杂的现实状况面前，往往卑微渺小、无计可施。

无人知晓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也无人敢保证自自己不会被感染——已经有案例显示，你可能在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就中招了。这就是阿甘本所谓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日常生活被扰乱，公共秩序失衡，安全感缺失，人人处于自危中。

网上流传着一段野猪在北京二环路上狂奔的视频，夜幕漆黑，路灯昏黄，黑褐色的猪鬃狰狞竖起。有人惊呼，这不是《釜山行》开头的翻版吗？现实魔幻，见怪不怪，可是这头惊恐无助的野猪，它能跑去哪里呢？



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成功訂閱同享優惠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舆情观察：李文亮去世后互联网上的一夜
2. 台湾口罩去哪儿？为何台湾政府全面禁止出口？
3. 无法抵达的物资：民间救援为何迟迟送不到一线医生手上？
4. 香港口罩去哪儿？四问进口受阻、储存机制和监管缺口
5. 疫情与体制：高效的“中国模式”，为何总是在公卫危机上重蹈覆辙？
6. 泛科学：三篇最新的新冠肺炎相关论文，都讲了什么？
7. 1.28疫情更新：内地停发港澳个人游签证，香港周四起暂关闭西九龙等站、香港往来内地...
8. 泛科学：关于新冠肺炎的20个传言，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9. 别让普通人李文亮，仅仅成为体制崩溃的注脚
10. “疫区”日记：在撤侨选择前，我决定留在武汉与父母相伴

编辑推荐

1. 奥斯卡前夕预测：“老白男”能度过外强中干的转型期吗？
2. 别让普通人李文亮，仅仅成为体制崩溃的注脚
3. 离开武汉的印度人：有人十二月得知疫情，有人回国就被确诊
4. 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揭晓前评析：应该入围的女性电影人去哪了？
5. 舆情观察：李文亮去世后互联网上的一夜
6. 郦菁：官僚体系与公民社会，谁是肺炎危机的答案？
7. 走在钢索上的各国政府：“撤侨”两头难、台湾尤甚
8. “疫区”日记：在撤侨选择前，我决定留在武汉与父母相伴

9. 从武汉返乡后，他们被泄露隐私、被警察铐走、被酒店驱赶

10. 断货的米铺和停摆的习俗：“封城”传闻中的潮汕春节

延伸阅读

无法抵达的物资：民间救援为何迟迟送不到一线医生手上？

中国当下防护服总产量不到武汉需求量的1/3，但所有民间捐赠都要通过红十字会，后者至今只拨出了收到捐款总额的1/8。

新冠肺炎阴影下的海外华人

海外华人圈里，有的组织募捐，有的被“黄色警告”，有的要求美国封关……一些中国人想要搭救中国人，还有一些中国人不欢迎中国人。

互动地图：新冠肺炎全球确诊病例分布

至今，新冠肺炎全球确诊病例数已超越SARS，且疫情仍在扩散。本页面将持续更新疫情进展，敬请关注。

“疫区”日记：疫情蔓延时，我回到湖北家乡

此时自己和家人身处在疫情的重灾区，去哪里都是危险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返回北京，也不知道这个疫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只能自求多福，也希望众人平安。